

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终身教授萨斯基娅·萨森： 在全球网络中观察城市

采访/罗婧

全球城市的这种“联系”和“对外开放”的理念极为相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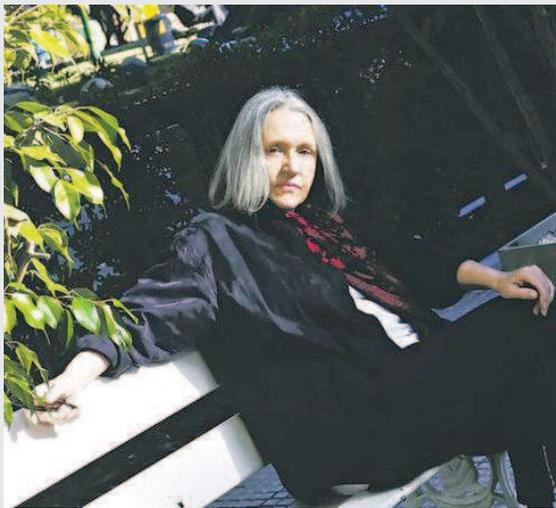
文汇报：首先感谢萨森教授在此次紧张的行程中拨冗接受采访。您在《全球城市》(The Global City)一书中首次提出和定义了“全球城市”这个概念，此后也一直积极推行这一概念，使之得到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认可和接受。在“全球城市”之前，学界还通行另一个概念——“世界城市”(the World City)，您觉得这两者之间最本质的差别是什么？

萨森：“世界城市”是一个比较老的提法，曾经使用了很长时间。我认为几千年前就已经有“世界城市”了，中国的一些城市一度也是世界城市。然后，世界上各个区域变得更加紧密，相互开放，当我在多年前提出“全球城市”这个概念时，脑海里是有非常明确的一些想法的。

第一，全球城市必须在某些方面具有领先地位，而且需要有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来支持城市发展。它也需要与不同国家的不同的城市加强联系。我的意思并不是说，一定要与整个国家有关联。这并不是国家对国家的互动，而是城市对城市的互动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伦敦、纽约比香港或其他城市更能适应这样的需求。大城市之间先发生关联，随后大城市也逐渐和其他国家相对较小的城市发生关联。实际上，谈到全球城市的这种联系，和“对外开放”的理念极为相似。

第二，在全球化有其固定的模式之前，世界经济已有很大的发展，然而全球化促使越来越多的公司能够在更多的国家设置分公司，这就必然会使得伦敦、纽约与巴黎、东京、上海等城市之间，相较于英国、美国的本土城市之间，更多地交织在一起。全球化重新定位了各个国家的城市，将其置于全球网络中，而不仅仅是与本国的小城市相互交织，这即是城市与城市的流动性。

第三，相对来说稍微复杂



萨斯基娅·萨森(Saskia Sassen)是“全球城市”(the Global City)概念的提出者，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终身教授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客座教授。

萨森学科背景多元，涉及社会学、政治学、哲学、经济学等多个学科，精通多国语言的她研究重心主要在移民与全球化、跨国主义、劳动力与资本流动等。1991年出版

的《全球城市：纽约、伦敦、东京》(The Global City: New York, London, Tokyo)奠定了她的学术声誉，该书的影响远超学界，中文版于2005年面世。

萨森的其他主要著作有：《The Mobility of Labor and Capital: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Labor Flow》(《劳动和资本的流动性：关于国际投资与劳动力流动》，

1990)、《Guests and Aliens》(《旅客与异族》，2000)、《A Sociology of Globalization》(《全球化的社会学》，2007)、《Territory, Authority, Rights: From Medieval to Global Assemblages》(《地域、权威、权利：从中世纪到全球聚集》，2008)等。中译本除《全球城市》外，还包括《全球化及其不满：关于人与金钱新流动性的论文集》(《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: Essays on the New Mobility of People and Money》，1999)、《驱逐：全球经济中的野蛮性与复杂性》(《Expulsions: Brutality and Complexity in the Global Economy》，2014)等。

萨森于近期来沪参加“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”全球城市理论前沿与上海实践研讨会。本刊就全球城市、全球化及难民危机等问题，对她进行了采访。

些，全球化一开始面对的是一些私人层面而不是公共层面的跨国活动，有时候甚至是一些不甚合规或者没有规律可循的活动。比如美国一直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石油，然而同样的进口标的，在具体进口的时候会面临各种变化，于是单纯的实际需求逐渐转变成一定程度上的贸易往来。比如法国从德国进口土豆，德国也同样从法国进口土豆，有时候你难免会想，这么你来我往的是在干嘛呢。这就是贸易活动，因为这样做能够从中获得利益。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媒介或者说是中间商的产生。所以，中间商愿意远距离地贩卖食物，因为他们关注的是贸易，而非食物本身。所以有时候，在贸易往来中，控制了中间商，那么就能获得成功。这样操作的另外一个主要真相就是金融化，更多的东西被金融化了。当金融进入货物往来的领域，它就创造了第三

重地带。我们回到具象物品的讨论，不管是土豆或者其他什么实物，金融一旦进入，那么金融家同样也参与买卖，但金融家与贸易商又完全不同，贸易商提供的是中转站，金融家却是将其转化成复杂的工具。

我近期的关注点在建筑物上，我觉得建筑也越来越金融化了。比如我们都知道的房地产市场，它们成为了搅动经济的催化剂。有些建筑物明明是空关着的，却在买卖过程中产生了很多利润。房子相当于被抽象化为金融工具了。如果房子被使用了，不论是民用或者公用，则房子就提供居住、办公等本来功能。所以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三角形，首先是贸易商，然后是惯有的买卖双方，再然后是第三方。一旦金融变成第三方，其他几方也就从具象的事物抽象出来了。这就是我最近的研究内容。

文汇报：在《全球城市》一书中，您选择纽约、伦敦、东京作为讨论的主要对象，在当时写作的过程中，选择这三个城市，尤其还包括东京这个东亚城市，是基于怎样的考量？

萨森：目前有很多全球城市，就看你如何定义“全球”了，稍微严格一点定义，至少有四十几个全球城市，如果放松一点要求，可能有七十几个全球城市吧。上海、北京、深圳现在都将全球城市作为发展计划。全球城市的重点不是在于制造产品，其必需的能力是在全球经济中拥有自身的创造力。所以，我认为主要的全球城市各有特色，它们肯定是相互不同的，当人们去快餐店买薯条时，或许觉得所有的城市都有其同质的一面，但全球城市的功能并不体现在这个上面，它们的功能是具体的、明确的。

我选择纽约、伦敦、东京作为全球城市，事实上是一种方

法论的尝试，我最开始试图将纽约和洛杉矶作为对比研究对象，然而洛杉矶却迟迟没有作为全球城市凸显，伦敦和东京却凸显出来，这是我没有预计到的，所以我不得不去伦敦和东京进行调查研究。我借用方法论来观察，在全球景观的维度中，什么功能在这些城市出现了。这三个城市在所有的方面都涌现出全球特征，它们脱颖而出。在一定的时段里，这三个城市以其网络涵盖了整个世界，例如东京的网络远至澳大利亚，近到亚洲其他地区，同时也把资金输送到伦敦。日本人在伦敦购买大楼，因为他们希望在伦敦开设公司，在纽约亦然。这是十分特殊的时刻，这些是我研究的开端。我只是以方法论开始，方法论事实上就是一种规则，否则你会说，我想研究这个，又想研究那个。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，是经过方法论筛选的城市，而不是我一开始预计的城市，因为我自己当时也是如此措手不及。

然而伴随着全球化扩张，我认为中介是最为关键的要素。一旦经济涉及越来越多的中间商，那么就有越来越多相关的城市加入进来。什么是中介呢？在如今这个全球经济的时代，如果你经营着一家传统却有影响力的、实力雄厚的企业，你依旧无法在家门口完成所有经营，你必须接触一些专业的服务，比如你需要花些时间去研习其他国家的法律法规，就这一点来说，全球经济就是一个中间领域。这个中间领域需要有十分睿智的经济学家、律师、金融家等等来参与，他们是特殊的部分。在我看来，过去这三四十年的全球经济依赖于中介，然而这种中介因素是十分松散的。

此外，我还想谈谈城市空间。打个比方，一个家庭住在一个两居室里，而一个超级富有的单身人士却住着一套超大的房子，其实这是在把一般收入的群体往外推。我们讨论的并不是那百分之一的超级巨富，他们一直都在那里，而是，百分之三十的高收入人群，他们虽不是超级富裕，但影响着城市生态，因为他们把其他人群包括中等收入群体推得